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 · 其他类

英汉翻译中的修辞学研究

The Study of Rhetoric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白 雅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2016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河南智慧旅游体验中的传统文化控因研究”（项目编号：162400410016）资助。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其他类

英汉翻译中的修辞学研究

The Study of Rhetoric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白 雅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翻译中的修辞学研究/白雅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096-5149-0

I. ①英… II. ①白… III. ①英语—翻译—修辞学—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710 号

组稿编辑: 杨 雪

责任编辑: 高 娅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超 凡 王纪慧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149-0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方修辞研究回顾与比较	1
一、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	1
二、西方古典修辞学	6
三、中西古代修辞学对比研究	11
四、中国当代修辞学回顾	13
五、西方“新修辞”理论	16
六、中西修辞思维对比研究	22
七、英汉修辞文化差异研究	25
八、英汉修辞衔接对比研究	28
第二章 修辞翻译中的影响因素	29
一、哲学对修辞翻译的影响	29
(一) 哲学与修辞学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影响	29
(二) 哲学对翻译的影响	37
二、美学对修辞翻译的影响	51
(一) 美学/诗学对修辞学的影响	51
(二) 美学/诗学对翻译的影响	78
三、语言学对修辞学和翻译的影响	85
(一) 语言学对修辞学的影响	85
(二) 语言学对翻译的影响	94

第三章 消极修辞与翻译	106
一、语法的修辞用法	108
(一) 动词时态的修辞作用	108
(二) 虚拟语气的修辞作用	109
(三) 情态动词的修辞作用	110
(四) 非限定动词的修辞作用	112
(五) 被动语态的修辞用法	113
二、结构性修辞翻译技巧	114
(一) 句式修辞	114
(二) 段落修辞	118
三、修辞写作特性	119
(一) 连贯与转折	120
(二) 词语搭配	122
(三) 统一与强调	124
(四) 文体	127
(五) 语篇铺述方法	130
(六) 变换与连续	132
第四章 积极修辞与翻译	134
一、音韵格	134
(一) 头韵	134
(二) 元韵	135
(三) 尾韵	136
(四) 拟声	137
(五) 双关	139
(六) 重复	141
二、意象修辞格	146
(一) 明喻	146

(二) 隐喻	154
(三) 换喻	169
(四) 提喻	180
(五) 换称	183
(六) 拟人	184
(七) 夸张	191
(八) 委婉	202
(九) 讽喻	205
(十) 类比	206
三、讽刺与幽默	207
(一) 幽默	207
(二) 反语	213
(三) 低调陈述	215
(四) 双关	222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28

第一章 中西方修辞研究回顾与比较

一、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

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关于先秦诸子对修辞的零星阐述，同时，出现了关于古代修辞学的第一篇专述——《墨子·小取》。这本书是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第一篇论文，上面记载着“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它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说明了辩论的方法和作用，但本著着重于阐述口语“辩”的作用与方法，分析了修辞的目的和功能，目的在于表情达意。

在这本书中还提到了论辩的七种方法：“或”、“假”、“效”、“辟”、“侔”、“援”、“推”，这七种方法分别从逻辑学和修辞的角度进行阐述。其中，“辟”就是比喻格，“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这是对比喻辞格的最早论述。

虽然《墨子·小取》写于先秦时期，表明我国的修辞学很早就有所发展，但是这些论述都还只是零星的、散乱的，并没有真正形成一门独立的修辞学科。两汉以后，直到南北朝时期，也有不少人发表了对修辞的看法。比较著名的有：汉朝刘向的“辞不可不修”说、扬雄的文质并重观、王充的言文一致修辞观、三国时期魏国曹丕《典论·论文》的修辞思想、晋朝陆机《文赋》的修辞思想、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修辞理论。这些有关修辞的论述中，除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集中的、系统的论述以外，其他都只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的、零星的论



述。所以，我们只把《文心雕龙》的问世看作中国古代修辞学初步建立的标志，在这之前的修辞研究都只看作修辞学的萌芽。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是文学理论的巨著，也是修辞理论的力作。全书各章几乎都涉及修辞问题，有的属于专章论述，有的是依题因体而论，其修辞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文心雕龙》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书中的修辞不仅涉及各个领域，而且相当系统。

《文心雕龙》阐述了修辞的基本原则，就是情意和文辞的密切结合、相互和谐。它在《体性》的开篇就提出“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精辟见解，并探索其原因为“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章的体式与文章的实情是相和谐的，也就是情意和文辞的和谐。怎么能达到这种高度呢？“功以学成，才力居中”，既要靠天赋的才能，也要有赖后天的学习。这就比三国时曹丕提出的“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说要客观而全面。情意是第一位的，文辞是第二位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附前者。这种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它阐述得明晰而透彻。如“辞为肤根，志实骨髓”（《体性》）；“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对此，作者在《附会》篇又作了全面阐述，应该“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他明确指出，事义、辞采和宫商都是为情志服务的，它们组成了有机的整体。

《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文体修辞的理论。刘勰在曹丕、陆机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又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大大发展了文体修辞的理论。可以说，《文心雕龙》前25篇都是论述文体的，把文体从“文”、“文笔杂”和“笔”三种类型分成33小类，并且分门别类论述了各自的修辞要义和特点。比如它对“铭”、“诔”两种文体的论述。同曹丕的“铭诔尚实”和陆机的“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比较起来，刘勰的阐述有了较大的发展。

《文心雕龙》初创了作家语言风格的理论系统。在曹丕、陆机风格论的启迪下，刘勰在《体性》中把文章风格归纳成八体：典雅、远奥、精约、繁缛、显附、壮丽、新奇和轻靡。然后又进一步把这八体分为四组，“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分别作了正反的对立比较。刘勰还把这八体风格与作家的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作家的气质个性充实情志，不同情志则表现为不同的言辞，所以，作家写诗都是情志的表现。总之，刘勰较系统地概括了作家语言风格的理论体系，在文学理论批评史和修辞学史上都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前人所不及的。

同时，这本书阐发了篇章修辞的要义。《文心雕龙》关于篇章修辞问题的阐发，主要从语言的角度，论述了篇章的特征，认为“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则成篇”（《章句》）。这种见解同我们今天对语言运用与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附会》开宗明义说：“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这里讲文章的通盘考虑和组织结构，是修辞中的首尾呼应，突出中心或主题的手法，这对于篇章修辞当然具有指导意义。应该说该篇在篇章修辞理论中具有纲领性的价值。

此书对比喻、夸饰、对偶等辞格作了精辟的论述。《文心雕龙》的后半部，有不少文章专门论述了修辞的辞格。比如《比兴》论比喻，它首先从概念上说明“比喻”与“起兴”的区别与联系，“比显而兴隐”，“比者，附也；兴者，起也”。其次讲了比喻的不同角度，“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最后它强调比喻的要旨在于恰切，即“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否则，“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当然，他也注意到比喻是在不同事物间运用的，“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胡越之物构成比喻的维系点，便是它们之间有相似性。

《夸饰》论述的是夸张辞格。刘勰认为“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是由来已久的，夸张的作用也是极其明显的。《丽辞》篇论述的“丽辞”即“俪辞”，也就是对偶修辞格。刘勰认为这种修辞方式，具有天然的相对相称的特点，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这就是对偶所赖以产生的源泉。关于对偶的原则，他指出必须掌握好“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要防止“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只有自觉讲究对偶的辩证特点，才能达到功出自然之效。

《事类》论述的是我们今天的“引用”辞格。刘勰在开篇就下定义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就是引用事例说明道理，援引古事以证今事的一种修辞方式。他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作了阐述，含义明确。然后他举实例证明了引用的两种方式，一是“略举人事，以征义”的暗引方



式，二是“全引成辞，以明理”的明引方式。他还指出了前人引用中的错误并加以订正，从引用失实的角度来反证引用主实的重要性。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最早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修辞问题的一部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但还不是古代修辞学成熟或正式建立的标志。

自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后，隋唐五代北宋的修辞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唐初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统治，以史为鉴，重视修史工作，大量史书问世。汉赋的铺陈华丽，魏晋南北朝骈体文的讲究声律、对偶，导致了辞藻华丽的风气盛行。文学对史书的影响很大，史学界也追求语言华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指出汉以后的史书“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俚事”（《史通通释·论赞》）。他花了九年时间写成中国及全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总结了唐朝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通》不仅拥有极高的史学地位，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是一部从史体角度论述修辞的杰作。

《史通》对史书的修辞作了全面论述，谈到词语、辞格、文体、风格等，概括了史书修辞的总原则——尚简要、重质朴。他推崇《左传》、《汉书》，因其符合“文约而事丰”的原则，即用简洁的文字包含丰富的内容。他认为史书不同于诗文，史书应“以实录直书为贵”。他提出“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即质朴但不俚野、有文采但不绮丽。他认为历史、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写史的目的是给今人和后人看，因此应用“当世口语”，不应机械模仿古语。提出了史书词句篇章修辞的要求。他认为史书的写作，无论记事、记言，都要用词准确达意。在篇章中，叙事应完整连贯、前后呼应，论述了史书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反对俚辞、夸张，提倡用避讳、委婉、比喻、模拟等。以上观点有重要价值，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今存作品五万余首，知名诗人逾两千人。这与当时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关。唐诗繁荣昌盛的时代和诗人们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带来了诗论修辞的独立与发达。正是从唐代开始，中国修辞学真正成为文论诗话的附庸。

唐代早期的诗论修辞的代表人物有王昌龄和李白。著名诗人王昌龄的《诗



格》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综述诗的修辞的著作，它论述的范围较广，包括修辞理论、词句修辞、修辞手法、风格等方面。王昌龄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从修辞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物境”方面，“如写山水，要得其形似”；“情境”、“意境”要“深得其情”、“得其真”，即诗人要有真情实感，表达要真实自然，诗歌才能具有令人共鸣、感动的艺术魅力。他继承了刘勰将一首诗视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对诗中字词的运用、一联中两句之间的关系、一诗中起句落句的表达方法等，均有独到的见解。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而且注重革新，反对“绮丽”、虚伪雕饰的风气，崇尚并大力提倡“清真”、清新自然、“文质相炳焕”的诗歌风格，提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主张。李白对诗歌风格的论述，对后世很有影响。

唐代中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提倡语言的千锤百炼，“新诗改罢自长吟”，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因此杜甫的大量诗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而他的注重语言锤炼的修辞观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中唐后期的伟大诗人白居易很重视修辞的作用。他认为诗歌的内容和情感是主要的、根本的，而诗歌的语言、声律和体裁、表现方法等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这些形式的运用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他和元稹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也就是要求语言质朴真实，通俗易懂，音韵自然上口，诗歌要起到对世事进行讽喻的作用。他根据这些修辞原则写了大量通俗明白、音韵自然和谐的诗歌，流传很广，深受百姓喜爱。

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诗的风格理论推向一个高峰。他把诗分为二十四种风格类型，提出了诗的风格多样化的思想。例如，论及“含蓄”风格时，他提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准则，这既是从美学角度论述诗歌，又是从修辞学角度来要求语言文字采用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

北宋诗话也非常繁荣，自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论修辞的新样式，大批诗话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刘放的《中山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洪迈的《容斋随笔》、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这种随笔式的文学评论样式反映了诗论修辞研究的深入。北宋诗话论述修辞的范围比较广泛，内容涉及言意关系、锻字炼句谋篇、修辞手法、修辞理解、文体风格等多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修辞的论述，如南朝梁时钟嵘《诗品序》关于诗



的修辞的论述，唐朝刘知几《史通》关于史书修辞的论述，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关于诗歌修辞的论述，韩愈、柳宗元、杜牧等人关于散文修辞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仍然是零星的，只偏重于某一方面的论述，还不能算是系统的、全面的、专门的论述，往往是和文学评论结合在一起的。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这就是陈骙的《文则》。《文则》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

总之，中国古代的修辞研究是同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哲学、逻辑学、美学、文章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有关修辞学的论述往往夹杂在众多的经解、文论、史论、诗话、词话、曲话、笔记、随笔之中，非常分散。其中多数探讨的是具体的修辞手法，成系统的探讨不多。到了南北朝和宋代，才分别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陈骙的《文则》，对诗文（尤其是文）修辞的规律作了系统的探索。至此，中国古代修辞学才得以正式成立。

二、西方古典修辞学

古希腊的早期民主制度孕育了修辞学。议会确保了雅典城邦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带领下，雅典的民主迎来了公正和机会的平等。这就意味着雅典公民可以凭借着自身的优点和效率，而不是财富的多少进入政府机关。古希腊人创造了政治自由的理念。

公元前5世纪，随着教育需求的增长，雅典诞生了一群教师，也就是诡辩家。这些诡辩家在雅典四处教学、演说、争辩，收取大量的费用，是雅典历史上第一次收取费用教授智慧的学家。然而这些诡辩家并不是哲学家，他们所教授的只是需求大的科目，包括修辞学、政治、语法、语源学、历史学、物理学和数学。普罗塔哥拉提是第一位诡辩家，这些诡辩家在当时的社会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在当时的雅典最受欢迎的是政治，所有诡辩家将重点放在了教授修辞学上。他们培训年轻的政治家，教授他们尽力使别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和信仰，哪怕使用暴力的手段。科拉斯是雅典历史上第一位修辞学家，他热衷于使修辞学的研究为实际生活服务。科拉斯认为合法的辩论应该包括引言、解释、论据和总结。这



一观点被亚里士多德所继承，西塞罗随后对其进行了补充，衍生成为了六段论。

高尔吉亚认为人类永远不能了解真理。他强调：万物皆不存在，即使事物存在它也不可知；即使它可知，其知识也不能被传达。因此，修辞学帮助我们看清楚了说话人的真正意图。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是高尔吉亚的弟子。在修辞教育上，他革新了师辈的技术中心主义，不再将单纯传授说服、论辩技巧看成是培养修辞人才的最佳途径，认为真正的雄辩只有通过全面掌握各领域的知识和各门类的艺术才可能产生，好的演说家除了修辞技巧之外，还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学、哲学、伦理和政治等素养。于是，公元前392年，伊索克拉底在雅典创立了一所当时最系统正规的学校，强调智育和德育对培养言说能力的重要性，为学生开设了范围广泛的课程，确立了以基础教育、强调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为理念的新教育模式。这一创举为西方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基本范式，他成为现代文科教育的先驱，并且奠定了修辞在西方教育传统中长期享有的中心地位。另外，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思想既继承前辈，又超越前辈。他和前辈一样认为言说能力对人类是极其重要的，他说：“言说是我们一切行为和思想的指南”。他超越前辈的认识是将言说看成是心灵的外在表现，认为“良好的表达能力是具有正常头脑的最准确标志，而真诚、合法、公正的话语是善良、诚信的灵魂的外在形象”。此外，在修辞学家中，是他首先指出修辞术是创造性的艺术，“好的言说必须具备三种品质，即所说的话与所处的场合相适配，文体风格恰如其分，表达独具匠心。”伊索克拉底是早期希腊最有影响力的修辞学家，虽然他的名气在西方修辞历史叙事中没有亚里士多德响亮，但他的观点得到了古罗马修辞学家的全面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是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他坚持修辞学是真理的表达和理性言语的艺术，而不是雄辩措辞。他认为有效演说的三大特点是清晰性、一致性、自然性。

西方古典修辞学的鼻祖首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他的《修辞学》是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是集中了他生活时代修辞学研究和教学的大成，又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新天地。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定义为发现可以用来就任何论题进行说服之手段的艺术。这门发现的艺术，既需要修辞者系统地调查他所面对的情景，又要寻找自身内在处理这个情景的才智和谋略。另外，修辞者还要调查听众，不仅要研究他们的具体文化的倾向性，还要研究他们所受年龄和社



会地位制约的情感。在寻找自身内在的才智和谋略时，修辞者应该使用启发法，如比较对照普遍概念等，以产生和构造盖然的论辩。修辞者应该选择最佳论辩，用最有效的顺序来组织安排它们，并在风格上进行修饰，选择最贴切的词汇，以表达安排得体的论辩。

亚里士多德在证明、辩证和修辞以及这三种不同手段所获得的认知之间划有重要的界限。证明所揭示的是自然世界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辩证则是用严密的演绎推理的逻辑来寻求证据充分的盖然真理，所探索的是不可能有绝对确定性答案的人类事务或哲学中的问题；修辞也是在人类事务的范畴里寻求证据充分的盖然真理，所依赖的不仅是通过证明和辩证而获得的认知，而且包括传统或普遍接受的智慧以及诸如上述所提到的普通概念那样的具有说服作用的各种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者所发现或创造的论辩要取得说服的效果，依赖于三种诉求方式：理性诉求、情感诉求和伦理诉求。在运用理性诉求时，发言者是在呼吁观众的推理和理解。换句话说，他是在说服。理性诉求、情感诉求的目的是寻求听众在感情上与演讲者保持一致。逻辑推理有两种基本方式：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从已知正确的论题中推到结论，而归纳推理则是观察一系列类似事实后的总结概括。

古罗马也对西方古典修辞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是位杰出的散文作家和才干超群的政治家，也是雄辩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其著作《雄辩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塞罗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雄辩家教育的理论。雄辩家与普通人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与一般能说会道的人不同。后者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能清楚地表达思想，而雄辩家则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生动的演说。其次，雄辩家比各专业人才在演讲方面更出色，更能说服人。最后，雄辩家拥有专门的雄辩技巧。他将亚里士多德的证明部分分成独立的范畴，因此将论辩四要素发展成六要素：开场白、铺陈叙述、论证要点、证明、反驳、结束语。一般人认为是西塞罗提出了三种文风：庄重体、中间体和平白体，分别用来感动听众、愉悦观众和教化观众。另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为昆体良（35~95年），他对古典修辞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五艺（无准则）理论：发现（通过考虑人物、事件、何时、何地、怎样和原因找到站得住脚的论点）、组织（如何有效地组织证据）、风格（如何措辞



和组织语句)、记忆(如何通过有效的记忆手段让观众对演讲记忆深刻的艺术)和演说(包括演说者的姿势、音调、手势和面部表情)。

古典修辞学是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来源,它对后世的修辞研究发展有极其深厚的影响。到了中世纪,修辞学有了两大重要的发展。第一,修辞学不仅是一门实用的艺术,更成为了一门学术的科目。第二,风格和演讲的重要性超越了“五艺”中的其他准则。修辞格有两类:转移修辞格(如隐喻、转喻、提喻)和结构修辞格(如高潮、重复、头韵、元韵)。修辞格不仅是装饰性的,它们还体现了发现论点和组织论据的策略。

中世纪想当硕士的本科生需要学习三门学科:语法、逻辑和修辞。硕士生接受额外的四门科目的训练: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几何学。修辞学的学习划分为两大部分:信件写作和布道。这两项受到“第二诡辩派”和圣·奥古斯丁、卡西多拉斯、依西多主教等作家的深刻影响。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试着融合古典修辞学和布道。在那个几乎没有实用修辞学的时代,他强调布道者应该用修辞说服人们而不是表现自我。他的修辞理论给布道修辞学打下了基础。之前无一古典修辞学家研究布道的艺术,但在研究修辞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础。卡西多拉斯(487~583年)是罗马作家、政治家。当时的皇帝和贵族们依靠识字的仆人组织、记录和转述重要的政治信息,卡西多拉斯为皇帝转述的信息后来整理为12本书。中世纪的学生学习书中信件,模仿格式,并学习如何润色。依西多主教(560~636年)是西班牙主教、圣人、中世纪百科全书式学者。《词源学》为其著作,是中世纪的教科书,风格简约,组织有序。第一本讲语法,包括诗韵格律。第二本讲辩证法和修辞学。他不注重“五艺”中的发现论点和组织论据,基本上忽略了记忆和演讲。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分为三大流派:传统派、拉米斯派、修辞格派。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修辞学家有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罗伦佐·瓦拉、阿格里科拉、托马斯·威尔逊。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强调丰富性。在文艺复兴之后,至少三类观点发展了修辞学理论:科学视角、雄辩视角和文学视角。这三个视角都坚持一个原则:修辞是动态的过程,修辞学不仅来源于过去,而且生根于当代。

培根(1561~1626年)的很多作品暗示科学视角是修辞学研究的新方向。培根区分逻辑和修辞、推理和想象,把它们看作是截然不同的思维能力,然而又认



为它们必须彼此协调。在重新定义发现论点时，他将传统的对演绎三段论省略式的强烈推崇减到最低，强调帮助科学家们打开脑海中储存知识的归纳推理的过程和记忆。培根推崇“西尼卡文体”，就是简单直接的文风，以短句、简单的词和不加修饰为特点。培根自己的生活格调和个人习惯倾向于奢侈，因此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辞藻华丽、句型夸张、效果夸大。但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简洁易懂，培根不惜故意打破原本平衡的结构来创作参差不齐但更深入人心的句子。培根认为，简易的文体就像数学一样能更好地解释科学家简洁客观的观察结果。

乔治·坎贝尔（1719~1796年）将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修辞学的原则融合在一起。他提出人的四项才能：理解力、想象力、热情和意志力。尽管说话者一般会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教化启迪或者影响他人意志，演讲会带来从属的修辞目的，就是加强说服力。

坎贝尔重新建立了修辞与心理学的重要关系，将演讲者的口才和对受众的影响联系起来。他也探索了将风趣、幽默和嘲弄作为修辞策略的用法，分析了演绎推理三段论的局限性，扩大了论据的种类（认为常识、经验、类比和证词等都可以作为论据），建立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使用原则（*Doctrine of Usage*），认为语言的归纳总结应该建立在当代负有盛名的作家基础上，而不是古典权威。

雄辩视角强调发表演讲，雄辩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公共演讲的技巧。雄辩家们认为修辞学家们一直忽略口头演讲，强调写作，但现在公开演讲、口头阅读、议会辩论、讲坛布道提供了很多口头表述观点的机会。托马斯·谢里丹的《讲座演讲》（1762）和约翰·沃克的《演讲元素》（1782）给演讲者提供发音、手势、声音控制和口音方面的建议。尽管雄辩家没有忽略发现论点，事实上他们把修辞学的范围缩小到关于演讲和文体方面，并把它们的应用局限到正式演讲文本。

文学视角既不注重公开演讲，也不像新科学那样注重文学语篇，它注重文体。新古典派（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寻求在传统的信念基础上重新建立评判标准。他们认为好的文体不一定是全新的和现代的，而是不加修饰、没有歧义、正确同时遵循希腊和拉丁模式的。另一学派崇尚华丽的文风，是发现论点的学习复苏。

18世纪开始，修辞学仍然是门重要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大部分被局限在了口



头与书面表达方式和演说的问题上。当然，伟大的修辞学家层出不穷，他们也开始探索修辞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但是说服的概念无法在强烈信仰科学方法的年代占到一席之地。

20 世纪见证了修辞学的再次兴起。

三、中西古代修辞学对比研究

中国的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是作为评论文章、游说君主的语言附属品产生的，其修辞观点、思想多零碎不成系统。《易乾文言》提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当时所谓的修辞是古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修辞学发端于公元前 5 世纪左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用于说服法庭审判官、国会元老和教堂听道群众的一种实用艺术，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中西两种文化下的修辞学在产生、功用、侧重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与这种语言活动的差异相对应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国的古代修辞学主要研究语言运用的手段、方法，尤其是书面语写作的手段、方法、风格以及原则。先秦时期的修辞论也涉及口语修辞，比如“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人而无辞，安所用之。……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刘向《说苑·善说》），这些就包括了口语修辞。秦代之后的修辞论，则基本是关于书面语写作的。这与古罗马、中世纪到 19 世纪的西方修辞学有相似之处。

中国的修辞学重感性，理论性、体系性较弱。它的产生是先秦时期文学家、训诂学家、哲学家在谈及文论、哲学时顺便提及的，当时对修辞的阐述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的修辞不是靠逻辑分析，而是靠直觉顿悟来表达直觉感受。在对修辞规律的把握上，更是依靠经验，用体验感悟来代替逻辑辩证，比如文学作品中善用类比和比喻等，自然缺乏理论的系统性，我们也只能从零散的语言中寻找他们的修辞思想。西方修辞学传统则重理性，《修辞学》充分体现了西方古典修辞研究的体系化和逻辑化。西方古典修辞学有着明